

维拉格·鲍尔瑙巴什 (Virág Barnabás)

# 经济学10x10——近一百年来 匈牙利经济史带来的教训



本文概述了近一百年来匈牙利的经济史,尤其是趋同成为发达经济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到了外部冲击、两次世界大战、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和苏联的压制。1990年政治转型后,许多人期待会快速出现经济奇迹,但实际上,经济转型期拖延了二十年之久。2010年后,当必要的财政、货币和结构改革完成后,可持续经济趋同才得以开始。从我国的经济史中得到的最重要教训就是,没有财政平衡,就不可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经济政策必须包括有效、针对性的措施,以便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保持宏观财政的平衡。

《经济文献杂志》(JEL) 编码: N14、E60、H11

关键词: 经济史; 经济周期; 公共政策

---

## 引言

尽管有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从史密斯(Smith)(1959)<sup>1</sup>到阿齐默鲁(Acemoglu)和罗宾逊(Robinson)(2012)<sup>2</sup>对各民族崛起和衰落的原因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一种有助于我们对这其中关键推动要素深入了解的有用工具,就是经济史。从长期历史看,我们能找到一些重复模式或经济周期,来帮助理解全球层面的发展怎样影响各个民族的未来。

---

维拉格·鲍尔瑙巴什(Virág Barnabás): 匈牙利国家银行副行长,负责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事务。

从经济史得出的观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匈牙利一直在努力挣扎着赶上欧洲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在匈牙利漫长的历史中，地缘政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14世纪和15世纪外，匈牙利很少有机会持续和独立地发展，甚至几次曾遭受过严重的冲击。过去的一百年也同样不平静：在这段时间里，匈牙利不得不三次彻底重建其经济，还承受过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这些外部冲击带来的后果就是，匈牙利无法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难以进行经济趋同。历史告诉我们，地缘政治可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因此，结成联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近年来，匈牙利与喀尔巴阡盆地一些同样快速发展的国家联合在了一起，这对于未来的经济趋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对生活在外国的匈牙利同胞有益。

然而，全球地缘政治学和经济周期无法解释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同。良好的治理和健全的经济政策对于攀登发展之梯是必不可少的。匈牙利在社会主义垮台后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具有教育意义。过度自由化和不计后果的财政政策，可影响持久的经济趋同，导致危机反复出现。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汲取了教训。2010年后，政府进行了几项财政和结构改革，以便稳定经济、促进增长、提高竞争力。改革主要集中在前期，即这些改革大多在2010年到2013年之间实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趋同期于2013年开始，到2019年时，匈牙利已经恢复成为本地区表现最佳的经济体之一。此外，整个十年间的经济保持稳定，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成就。

在本文中，我将探讨近一百年的匈牙利经济史。起点是外部强加的、悲剧性的《特里亚农和平条约》，该条约沉重打击了匈牙利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我将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可怕经济影响，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压迫，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我将讨论除战争外，几十年的政治压迫、反复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和国内经济政策错误给匈牙利经济趋同带来的阻碍。确实，在某些时期，匈牙利能做到部分经济趋同，但大多数情况下，它总是承受着外部冲击、国内引发的失衡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发展资金主要靠（不断攀升的）外债的国家，长期以来，匈牙利的增长模式呈现出在增长和平衡之间摇摆的特点。由于缺乏经济现代化和竞争力不足，趋同机会常常会很快随世界经济风向的改变而消失。

本文主要依赖《10x10年的数据——过去一百年的匈牙利经济史》（MNB, 2020）一书中的分析和数据集，该书覆盖了过去一百年（以十年为一个时期单独讲述）来匈牙利的历史，基于尽可能全面的资料。本文的研究重点更多地集中在政策困境上，还包括经济发展中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不平衡。在下文中，我将先简单讨论一下我用于经济进步研究的主要方法，并对过去的一百年做个概述。然后我将单独讨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特里亚农和平条约》开始，到苏联压迫开始时结束。第二个时期为社会主义时期，第三个时期为接下来的三十年。

##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 过去一百年的简要评价

经济进步的一个关键指标是与奥地利相比, 匈牙利的相对发展率。但是, 如果只靠这一指标的话, 经常会出现误导。购买力平价, 是用于计算相对发展率的一种基本统计指标, 即使今天也极其难以可靠地测算, 回顾历史, 更是极大地增加了统计数字的不确定性。因此, 依赖更多的指标也许是个更明智的选择。相对经济进步的一个替代指标是增长率差。虽然它的测算误差很高(尤其是在样本的前半部分), 但可以提供一些与发展有关的额外信息。即使这些指标显示出经济趋同, 但需注意的是, 多年高增长率的代价, 是经济失衡的加剧。这些时期之后紧随的是严重的经济衰退, 因此, 需要失衡指标来确定是否经济进步为真。最后一点, 只有大范围的经济增长才会对社会有价值, 故经济进步的指标体系应涉及一些生活水平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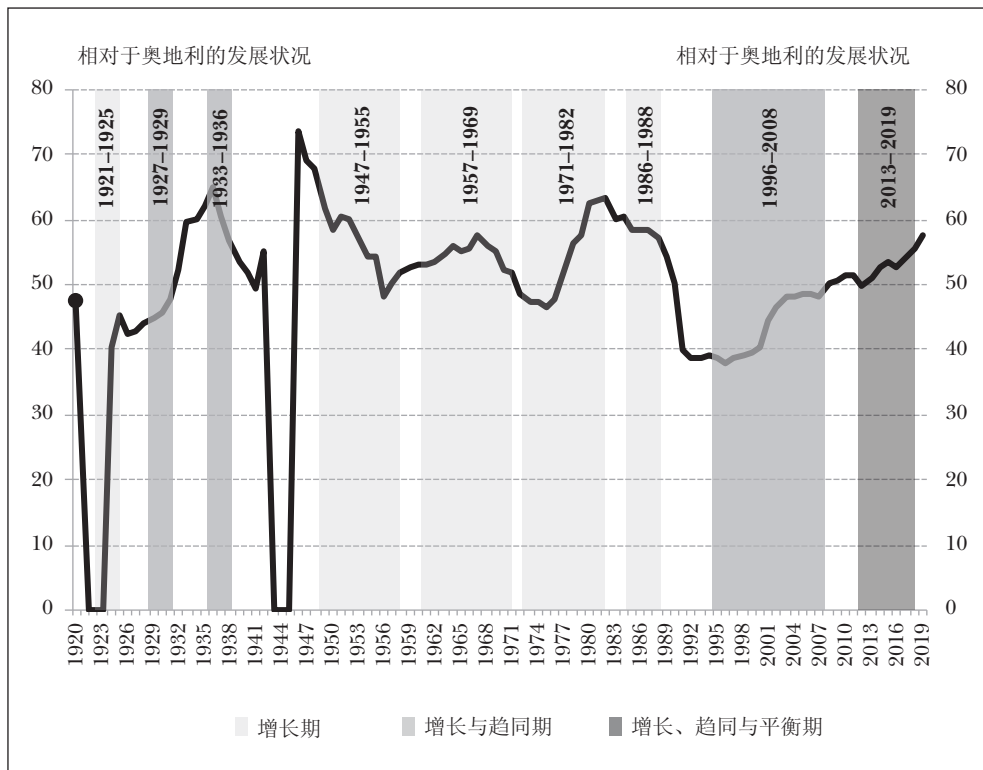
别忘了这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让我们继续探讨匈牙利一百年来长期的一系列增长率和相对发展指数。我们可以观察到相对发展指数在很大的范围内波动, 但在整个样本中没有正趋同趋势的迹象。大规模的全球经济低迷, 可对匈牙利的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导致相对发展指数降低。增长率差显示, 匈牙利的增长率很少超过奥地利的增长率。共产主义体制造成的经济损害也非常惊人。匈牙利国内持续了几乎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 并未形成任何明显的经济趋同期, 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崩溃。在社会主义体制垮台后, 经过了超出预期时间的转型期, 经济才开始趋同。但是, 我们目前仍然处于历史的波动带内, 因此, 进一步提高竞争力, 对于保持趋同进程具有长期的重要意义。

在过去的一百年内, 匈牙利的经济常常无法做到快速增长, 在2010年前, 还常常伴有内部和外部平衡的恶化。健全的宏观财政平衡, 常常不被视为趋同因素, 但从长期角度看, 这一平衡的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经济史研究可知, 只有保持经济平衡, 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失衡将导致延缓增长的危机出现, 影响可达数年, 甚至整整十年。发展中国家经济趋同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 与发达国家相比, 发展中国家更常受到较严重危机的打击。这些危机可源自严重的内部问题, 或者如果经济失衡, 整个国家在遇到外部冲击时, 遭受的打击会更加沉重。

在匈牙利的经济史中, 有许多不同的经济失衡例子。例如, 在20世纪80年代, 和21世纪00年代, 失衡以外债累积的形式出现。债务首先导致经济停滞, 然后放大了外部冲击(分别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全球金融危机), 进而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

除了增长和平衡外, 第三个经济趋同的因素是生活和福利水平。只有在大范围经济增长时, 社会才能受益。近几十年来, 对财富和收入分配的研究显示, 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繁荣。不加监管的自由市场经济往往会造成过度的不平衡, 加重社会矛盾, 从而通过限制社会流动性削弱未来的经济增长推动力, 还会对人

图1、匈牙利与奥地利增长与趋同期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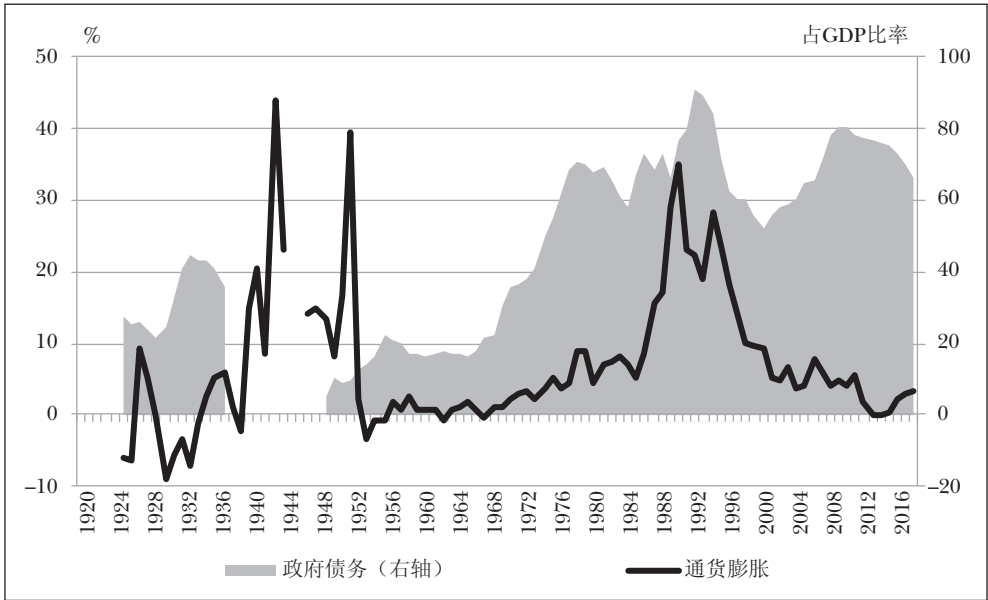
备注：Maddison项目数据库的数据至1990年，Ameco数据库的数据自1991年，欧洲统计局的数据自1995年。

来源：Maddison项目数据库、Ameco数据库、欧洲统计局、匈牙利国家银行

力资本积累造成负面影响。这些问题需要国家干预。但是，过多的国家干预也可能事与愿违。在匈牙利，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固有缺陷是，由于它追求的是过度的平等，因此不会给有突出绩效和创新的个人以奖励。经济史研究表明，那些成功的国家，都是国家力量与市场和谐共存的国家。国家与市场之间保持平衡，才能扩大中产阶级，增强凝聚力，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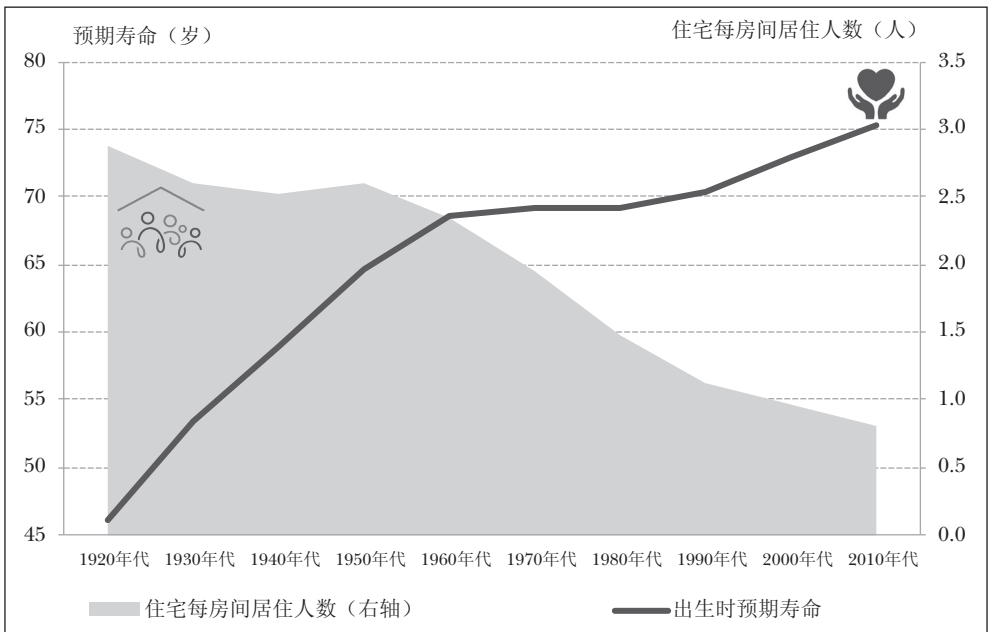
生活水平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许多非经济因素。在一百年这一时间跨度之初，《特里亚农和平条约》不仅对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对家庭也同样如此。63%的人口被划分到匈牙利之外，许多家庭因生活水平的剧烈下降而破裂。不过，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匈牙利人的生活水平仍然有着很大的进步。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非没有间断过，例如，1966年时，匈牙利人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为69岁，此后就一直停滞不前，直到世纪之交时才有所提高。

图2、政府债务和通货膨胀



来源：匈牙利中央统计局和匈牙利国家银行

图3、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及住宅每房间居住人数



来源：匈牙利中央统计局和匈牙利国家银行

为全面了解经济发展,在接下来的三个章节中,我将从以上提到的三个方面讨论匈牙利的经济进步,这三个方面分别是: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失衡和生活水平。我要说的是,在大多数时间,由于各种外部因素和国内种种失败的缘故,匈牙利未能趋同到欧洲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不过,在过去的十年间,正确的经济政策确保了经济增长和宏观财政平衡,因此形成了一个经济趋同期,有望实现持续的经济进步。

## 从《特里亚农和平条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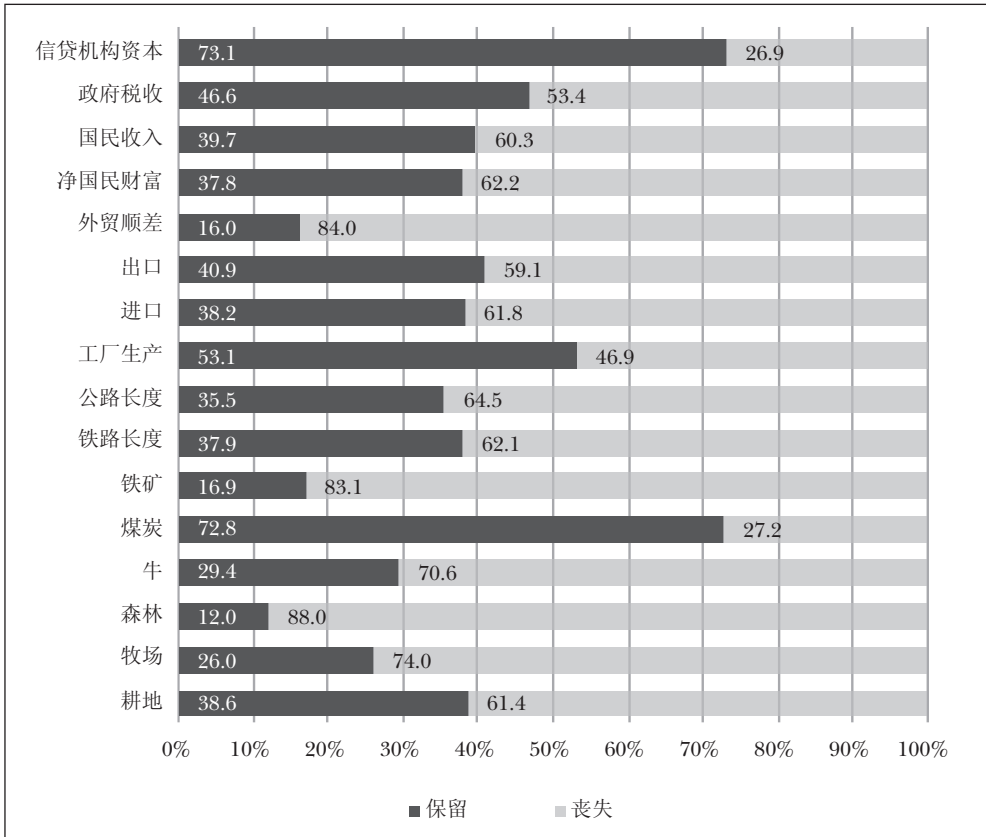
过去的一百年从一次历史创伤即《特里亚农和平条约》<sup>3</sup>开始,匈牙利因此失去了71%的国土和超过63%的人口。这一条约对于经济来说同样是一场灾难,而此时匈牙利的经济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过重创。新的边境划分完全摧毁了生产链。虽然在新的边境划分后,主要的加工能力还位于匈牙利国内,但矿产资源和超过一半的可耕种土地被划分了出去。新的边境划分,造成一些产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铁路机械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曾与整个国家铁路网络对机械设备的总体需求匹配,在条约签订后,仅有40%的铁路网络位于新边境线内。先前世界闻名的匈牙利磨粉业失去了它的原材料基地。战前,布达佩斯是世界上第二大面粉生产城市。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新边境划分后的国土不再能生产出足够的谷物,甚至连布达佩斯一个城市的产能都无法满足(Berend、Ránki, 1972)。

奥匈帝国的解体改变了许多内部与外部的贸易联系。在原来,匈牙利的产品大多数销往帝国保护下的内部市场(5000万人口),而匈牙利人使用的许多商品也大多来自该帝国。由于划分新国界的缘故,对外贸易变得更为重要:既要满足各行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还要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为管理匈牙利的对外贸易,制订了新的关税制度。海关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护匈牙利工业的利益,对加工产品征收30%的关税,对轻工业产品征收的税率接近50%。

金融产业也不得不彻底重建。1924年,匈牙利国家银行成立。为确保商品进口的换汇需求,实行了固定外汇管理政策,出口商必须将他们的外汇收入转化为匈牙利货币,以便满足授权进口商品的外汇需求(Szakács, 2000)。固定外汇管理政策一直执行到1925年年底(1932年又重新启用这一政策)。

尽管存在着巨大挑战,但到1927年时,经济已从战争和《特里亚农和平条约》的冲击下快速恢复过来,达到了战前水平(版图为《特里亚农和平条约》签订后的匈牙利版图)。1929-1933年的大萧条对匈牙利造成了很大影响,其出口市场出现萎缩,但随后开始恢复。尽管匈牙利是一个原材料匮乏的国家,但仍有几家匈牙利公司的生产达到了欧洲水平,它们均属于高附加值的产业。电子设备制造业内的通斯拉姆(Tungsram)和欧里昂(Orion)公司就是两个例子,其他还有机械制造业内的维斯·曼弗雷德(Weiss Manfréd)钢铁金属厂公司和甘兹(Ganz)制造厂(Romsics, 2017)。

图4、《特里亚农条约》对匈牙利宏观经济主要指标和结构的影响



来源: 匈牙利统计评论 (1938)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 匈牙利的对外贸易关系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到20世纪20年代末时, 奥地利仍然是匈牙利最重要的国外市场 (占出口额的29%), 但到了30年代, 德国成为了匈牙利最大的出口市场, 意大利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进口方面, 产品组成的变化清楚地反映出国内工业竞争力的提高。进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工业成品变成了原材料。1920年, 仅22%的进口货物为原材料和半成品, 接近78%的进口货物为成品。1930年, 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进口上升到了74%, 而成品的进口下降到了26% (Szakács, 200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匈牙利的经济进步。政府实行战时经济政策, 对生产投入进行了重新分配, 偏重于给军队生产用品的行业。1944-1945年, 在匈牙利国土上发生的战争, 使产量下降到了1938-1939年时的一半左右。农业和制造业的产量下降尤为明显。在战争期间, 损失了40%的国家财富 (相当于大约4年的GDP), 而战争赔偿又相当于另外两年半的GDP (Bokor, 1955)。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考虑到经济遭受的严重冲击,很难达到和维持健全的宏观财政平衡。由于并不总是可以获得外部融资,因此,政府和私营业界不得不快速适应这种情况。1924年初,匈牙利还是努力从国际联盟获得了一大笔贷款,但贷款的财政条件很严苛。贷款的条件包括要求其在两年内达到预算平衡。为改善预算状况,政府大幅增加了直接税、收入和财产税、消费税以及关税。经济增长也为税收的增加提供了保证。在1924—1925财年,匈牙利恢复了财政平衡,并保持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后半期。1929—1933年经济萧条时期,由于税收减少和出口补贴增加,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开始增加,但到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时,政府设法恢复了预算平衡(Matolcsy、Varga, 1938)。

外部融资的可用,给经常账户赤字造成了强烈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恢复产能,不得不鼓励投资,因此融资需求巨大。然而,直到20年代后半期,匈牙利才获得外部融资。此后,不断增长的经济带来的进口需求,导致了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而国际贷款的高利息,又进一步增加了这一赤字。在大萧条时期,国际金融系统崩溃,匈牙利再次失去了外部融资。在经过对贸易流动的大幅调整后,经常账户才实现平衡(Kaposi, 2010)。

尽管存在着外部冲击,政府的财政政策还是做到了财政平衡,确保了经济的增长。然而,这一脆弱的平衡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到1943年时,匈牙利政府的债务已升至GDP的50%左右。国外借款没有可能,匈牙利国家银行只好印刷货币来补偿政府的一般性支出,结果导致了高通货膨胀。战后货币的购买力快速下降,这一时期匈牙利的通货膨胀率增长速度,在世界历史上都可以名列前茅(Botos, 2016)。宏观财政稳定性被彻底摧毁。

尽管1920年创伤后的20年间,经济增长摇摆不定,但生活水平仍然大幅上升,尤其是在城市地区。这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大。工业行业内,由于大萧条,实际收入甚至未达到战前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的水平。不过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成功实施的许多现代社会政策。从那时起80-90%的城市工人阶级获得了疾病和意外保险,到1928年,还强制性地推行了养老保险、伤残保险、鳏寡保险和孤儿保险。

20世纪20年代匈牙利的一项突出成就是教育改革,这一改革与克莱贝尔斯堡·库诺(Klebelberg Kuno)<sup>4</sup>有关。公共教育方面最重要的成就是扫除文盲。到1940年时,匈牙利6岁以上人口中92%的人具备读写能力,这与周围的其他东欧国家相比,是一项很突出的成就。当时的中等教育水平公认较高,同时,中学毕业生的人数也有所增加(Gunst, 1996)。1938年,近6%的成年人完成了中等教育。这一比例仅稍稍低于德国,比法国稍高一点。

公共卫生改革也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一改革的起点较为有利:1920年划分新国界后,大约六分之五的医生居住在匈牙利境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医生的数目和病床的床位数进一步增加。由于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和感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显著减少,匈牙利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从42岁增加到了55岁以上(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1996)。

## 苏联时期的经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采用了一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由国家完全控制产品的生产和价格。新的国际经济合作由苏联决定,彻底改变了匈牙利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新的经济模式终结了匈牙利人的农业和轻工业传统,转为强行发展重工业,但实际上匈牙利并无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基础。

苏联经济模式有着严重的缺点。该模式不鼓励个人表现,过于注重平等而非效率,因此,不能带来长期持续的经济成果。由于缺少市场协调、缺乏创新激励、缺乏为提高生产率做出的努力,经济增长受到阻碍。企业很难从创新中获得任何收益,如果它们有损失的话,国家会给予补偿(软预算约束)。经济体制的僵硬导致了效率非常低,但由于政府实施管控,后果暂时被掩盖。政府通过平价来防止通货膨胀,同时用低效的工作来解决失业问题,即“就业内的失业”。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低效率如此明显,以致社会主义政府都不得不启动谨慎的改革。从1968年起,由于启用了新经济机制,指令性经济体制略有起色。企业可部分控制税后收入,可决定某些投资项目,但重要的投资仍然必须由政府决定。另一项重要的措施是建立了一个有限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虽然基本食品、原材料和各种服务的价格仍继续由政府决定,但是大约30%的产品价格不再受管制(MNB, 2016)。在早期,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由于苏联的批评,新措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废止。20世纪80年代,政府实行了一系列与税收制度、私有制、银行体系有关的新改革。然而,这些改革缺乏整体概念,而且政治领导人也并不真心支持。最终,在经济和社会压力下,没有自我调整能力的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了。

经济调节能力的缺失、社会主义政府优先(重于不断提高家庭收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财政平衡造成了强烈影响。苏联时期,经济重建和对重工业的巨大投入,产生了巨额的融资需求,最终给保持宏观财政平衡造成了压力。而且,在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后,宏观经济失衡变得更加难以量化。在几乎完全基于国有制的体制中,政府总赤字与政府债务变得难以区分,因为很难在广义的政府和国有企业体制之间分清界限。相对价格被扭曲,以便支持重工业的发展,但如此一来给轻工业、服务业和农业造成了损害,产生了传统统计方法无法察觉的新形式的失衡(如短缺)。

而且,社会主义政府优先(重于不断提高家庭收入)以便避免社会压力这一做法,使健全的宏观财政平衡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时变得明显,原因是贸易条件(进出口交换比率)发生了越来越不利的变化(主要应归因于原油价格突然上涨)。不过原油价格冲击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出现得较迟,原因是苏联原油的出口价格到1976年才开始上升,但社会主义经济体不能对此做出调整。由于这些贸易价格中的不利变化和缺乏竞争力的出口产品,从1974年起,贸易平衡和经常账户中开始出现严重的赤字(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1989)。由于

经济与政府之间的严重相互依赖性，上述情况反映在政府债务的增加上，十年间，政府债务从占GDP的30%上升到了71%。债务几乎完全是外债，一半以上以美元和德国马克结算（实际上，这些债务中的一些借给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于1982年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目的是能继续从西方投资者那里获得贷款。20世纪80年代，未偿还贷款额的攀升，不仅仅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应归因于错误的财政决策（未偿还贷款的升值和高利息率）。

越来越严重的宏观财政失衡，造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质上已经崩溃。同时存在的、长期的经常账户和政府总预算高赤字，导致财政上已经无法再维持。此外，由于债务的持续增加，人为的低日用品（尤其是能源和汽油）价格也无法再保持下去，导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恢复宏观财政平衡需要进行重大调整，但由于这样做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后果，因此，在社会主义政体内，这样的调整在政治上不可能实行（Honvéri, 2013）。

原因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承诺是，在实现生活水平稳步增长的同时，避免社会出现明显的不平等。然而，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政府控制和保持过分的平等，严重影响到了效率，致生活水平实际上也开始下降。此外，政府控制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经济政策（例如“拉特科时代”的禁止堕胎法<sup>5</sup>），这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生活质量，尤其以苏联时代的前半期为甚。1956年，革命后的报复行动迫使20万人移居外国，也从多个方面对生活水平造成了不利后果（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1996）。但如果不把这些考虑在内的话，生活水平的某些方面实际上是在逐渐提高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匈牙利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中，能存入银行的比例越来越高，这最初反映在住房储蓄上，后来反映在金融财富的显著增加上。虽然政府并不能充分解决住房问题，但城市化进程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在20世纪60年和70年代，匈牙利每年增加6-9万套单元房，其中三分之二为私人建造。单元房的品质较低，1969年时，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仍然生活在没有现代生活设施的风子里。预期寿命的延长到1966年时达到了69岁，从此停滞不前，直到本世纪之交时才超过了69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部分由于油价飙升，部分由于人口因素，生活水平的提升开始停滞。居民的实际收入开始下降，政府只能通过增加福利来抵消这一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在社会主义体制崩溃前，苏联阵营与西欧相比，生活水平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

## 回归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阵营垮台后的三十年可以分为两个亚时期。前两个十年可以被视为一个延长的转型期（实际上更长一点），原因是政府的政策错误。然而，尽管经历了种种失败，匈牙利最终还是融入了欧洲经济，并于2004年加入了欧盟，巩固了它的地缘政治地位。在第三个十年，政府和中央银行设法成功落实了新的经济趋同战略，经济开始快速增长。

## 从转型危机到大衰退

社会主义阵营垮台后,在1990年,匈牙利进行了它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总理安道尔·约瑟夫(Antall József)<sup>6</sup>组建了新政府。公众的期望高涨,对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充满了信任,认为匈牙利将很快发展起来,经济将快速趋同到西方国家的水平。但事实证明,转型期比预想的要长。经济政策快速向着市场经济转型,即所谓的休克疗法。贸易自由化,取消关税和出口补贴。企业的环境快速改变,经济主体几乎没有时间为此做出调整。匈牙利失去了它的东欧贸易伙伴,同时又根本无法同西方经济体竞争。转型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一百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家庭收入的减少,曾一度因朝向家庭的财政转移而得到了缓解,但随后又导致了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采取措施恢复了宏观财政平衡,包括财政紧缩、外汇贬值、提高进口税等措施。这些收紧措施更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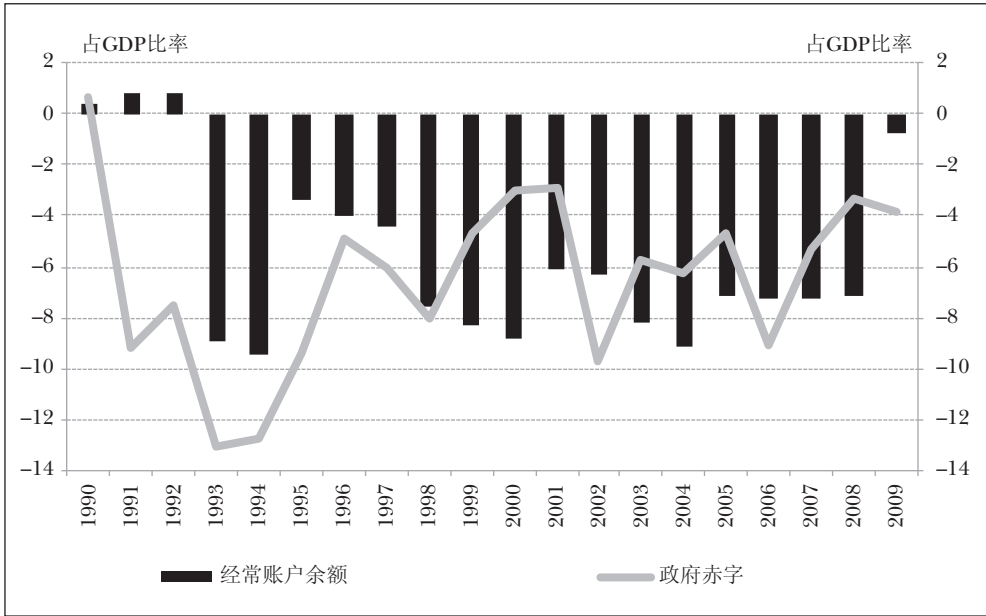
幸运的是,重归市场经济的努力结出了果实。由于匈牙利工人技术熟练,工资低,国外的直接投资大量涌入到匈牙利的经济中。企业越来越融入到欧洲经济中,出口开始快速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时,欧盟在匈牙利的对外贸易中占据了主导份额。匈牙利的地缘政治地位,因1999年加入北约和2004年加入欧盟而得到了巩固,确保了经济长期进步所需的稳定环境。

进驻匈牙利的外国公司在匈牙利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同时它们也促成了一种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大型外国独资企业富有竞争力,足以进入全世界的出口市场,而匈牙利小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力则远远落在后面。巨大的生产力差距长期存在,表明匈牙利的经济结构上存在着薄弱环节。新世纪之初,匈牙利成为了中东欧地区的经济领跑者,到21世纪前10年中期时,政府和家庭只能通过外来资金保持经济增长,代价是同期的高预算和经常账户赤字,以及不断攀升的外债。2006年后,所有这些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停滞。除了高失业率和投资活动萎靡外,高负债(外币)也成为一个严重的结构问题。由于21世纪前10年的错误政策,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匈牙利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一度是中东欧地区领跑者的匈牙利,现在变成了该地区最差的国家之一。

在政权更迭后的二十年间,匈牙利在该地区表现相对较差的最重要原因是经济政策未能实现和维持健全的宏观财政平衡。平衡和经济增长不能兼得,实现一方,只能损害另一方。在转型的第一年时,经济衰退导致进口减少,但由于税收收入的下降,预算赤字进一步增长。匈牙利是中东欧地区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政府债务最高的国家,经济转型危机将它的债务率从1990年的66%增加到了1993年的90%(P. Kiss、Szapáry, 2000)。在那之后,随着GDP的增长,匈牙利的经济显示出恢复的迹象,同时债务率下降。但同时,经常账户项目赤字扩大。为恢复平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政府使福林(匈牙利货币)贬值,提高了管制价格(Jakab、Szapáry, 1998)。高通货膨胀持续了多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下降到20%以下)。新世纪前后,经济政策同时改善了财政平衡和经济增

长, 从2002年起, 预算赤字的猛增使这一好时期不复存在。到21世纪00年代中期时, 再次出现了严重的双赤字, 即整个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和外债同时增加。

图5、匈牙利经常账户余额和政府余额占GDP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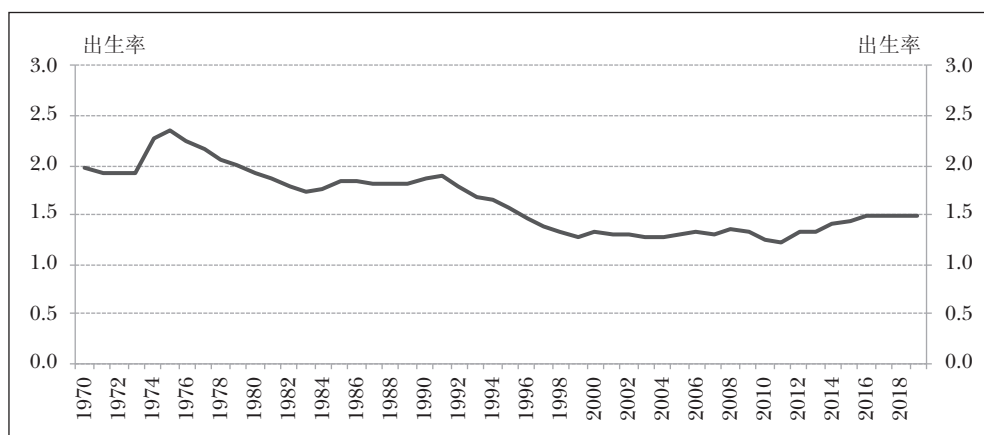
备注: 财政赤字数据显示为当前的统计方法。同期数据表明1990-1999年的赤字较小。

来源: 1990-1999: P. Kiss、Szapáry (2000), 2000-2009: MNB

虽然在1990年之后的20年内, 匈牙利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得到了提高, 但仍会随经济周期波动, 只有到21世纪前10年时, 才得到大范围的发展 (Matolcsy, 2015)。政治变革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而非预想中的自由和福利。快速市场自由化、放宽监管和私有化的结果, 就是相当大比例的国内工业和企业消失了, 大约100万人失去了工作, 其中有很多再也未能找到工作, 而就业者的实际工资也大大减少。1993年, 消费开始再次增长。1994年, 实际收入开始增长, 但随后政府旨在恢复平衡的措施限制了进一步的增长 (Matolcsy, 1996)。从1995年开始, 两年内实际工资下降了16%, 人均消费下降了大约10%。1995年之后到2006年, 家庭收入和消费稳步增长, 但2002年之后, 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债务和家庭贷款的增长。2006年的财政紧缩计划, 再次降低了生活水平, 此时财政危机尚未爆发。在此之后, 由于财政危机和管理不善, 失业人数增加了大约15万人, 就业者的实际收入下降。家庭先前累积的以外币为主的贷款的分期付款额的增加, 使大量外币债务人很难保住自己的住房。

经济发展和家庭收入的波动、就业保障的丧失、日益增加的不可预测性、每日生活的不确定性, 导致生育率也出现了下降。总的生育率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经开始下降, 但在延长的转型期间, 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生育率骤降到了1.3, 并长期保持低位, 给匈牙利带来了新的、长期的难题。

图6、出生率 (1970-2019)



来源: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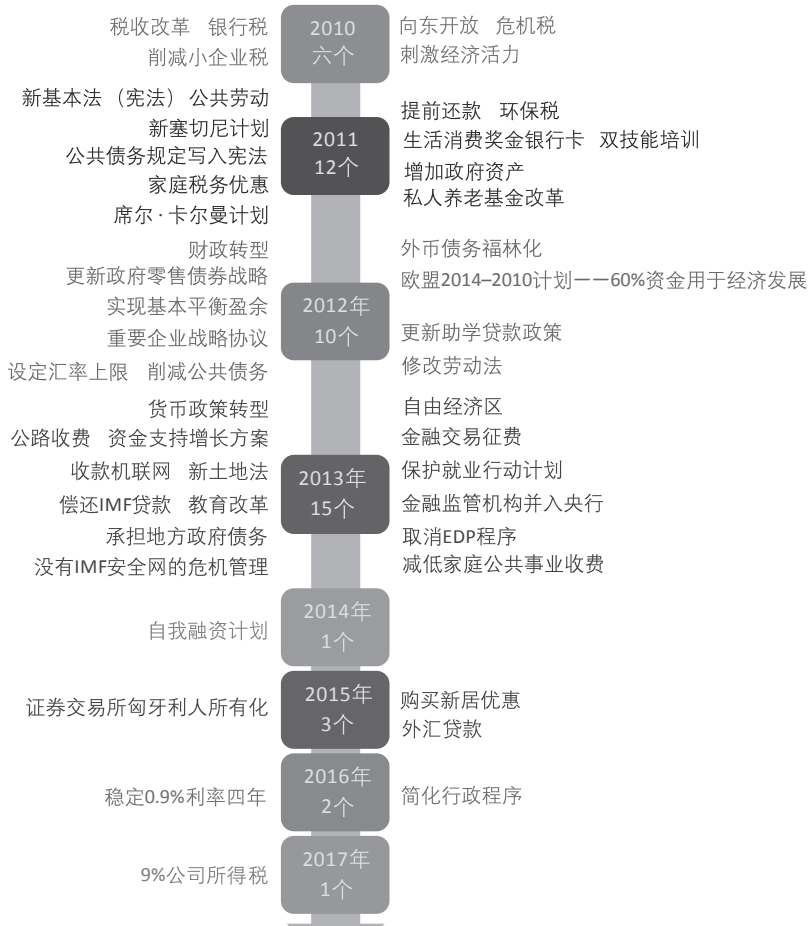
## 健全的宏观财政平衡下趋同

2010年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平衡, 并把增加就业视为关键因素。作为2010年后财政改革和2013年起的货币政策措施的结果, 匈牙利踏上了经济增长和趋同的道路。在确保宏观财政平衡后, 政府主动采取措施增强经济竞争力。自2010年以来, 政府发布并实行了许多新的措施, 尤其是这十年的前半期。

得益于支持性的公共政策, 2013年到2019年之间匈牙利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8%。这比欧盟的平均增长率高了2个百分点, 结果就是经济的快速趋同 (Matolcsy、Palotai, 2018)。到这一个十年的末尾时, 匈牙利的投资率跃居欧盟首列, 预示着高速增长长期仍将持续。同时, 匈牙利的经济发展水平超出了欧盟平均水平74%, 高于波兰和斯洛伐克的水平。

2010年后, 政府总赤字和其他宏观财政稳定性指标也出现了显著改善。经过必要的经济调整后, 危机期间经常账户项目已经开始有起色, 紧接着从2012年起, 预算恢复了平衡, 这是新类型财政改革的结果, 这一改革把重点放在了经济增长和平衡上 (Matolcsy、Palotai, 2016)。从2013年开始, 货币政策出现了转变。为保持通货膨胀目标优先, 中央银行降低了利息率, 鼓励在合理的结构内贷款, 支持将家庭的外币贷款转化为用福林结算的贷款, 促进经济融资。在这一个

图7、2010年起的50个改革举措



来源: 鲍克绍伊 (Baksay) 等 (2020)

十年间, 无论是政府债务还是外债均稳步下降, 净外债已经下降到了GDP的10%左右。低通货膨胀率进一步反映出几乎平衡的经济状态, 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接近了中央银行定下的2017年后3%的目标 (Hajnal、Várhegyi, 2019)。

政府选择把提高就业作为重中之重, 这对于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提高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 匈牙利总人口中的工作人口所占的比例是欧盟最低的, 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 就业人数增加了80万人左右, 达到了欧盟平均水平。在这一个十年的后半期, 就业的增加伴随着实际工资的快速增长, 越来越多的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21世纪前10年, 匈牙利面对贫困和社会排斥风险的社会群体比例下降幅度最大。此外, 得益于高增长和家庭金融财富的快速增长, 按国际比较, 匈牙利的不平等保持在中等水平。

政府的新住房政策致力于通过确保经济适用房来提高生活水平。住房问题可回溯到社会主义时期,从政治转型一直持续到今天。住房供应的不足和可负担融资的缺乏,共同导致了新房屋数目的不足。在21世纪前10年,政府提供有针对性的新补贴来支持住房供给,同时中央银行加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定了新规章来确保抵押贷款市场的公平性和竞争性。

为提高生活水平,公共政策把目标放在了对家庭的支持上。政府实施了许多有利于家庭的方案,给有子女家庭的现金补贴处于欧洲前列。然而,人口的持续下降趋势表明,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虽然生育率开始有所回升,但仍然达不到2.1这一政府定下的中期目标水平。

## 总结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匈牙利试图达到西欧经济发展水平的努力多次失败。在本文中,我分析了经济趋同受阻的原因。通过找出过去的错误,我们可以在未来避免重蹈覆辙。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匈牙利经济趋同的阻力主要来自外部。在《特里亚农和平条约》带来创伤后的五十年内,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主要进行了成功的重建,但大萧条的爆发,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和国际金融的崩溃,这些阻碍了匈牙利经济的发展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个大国就它们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达成了共识,匈牙利成为了苏联阵营的一员。在这之后的四十年间,计划经济的推行,摒弃了经济趋同的可能。

在苏联阵营瓦解后,匈牙利引入了市场经济,开始融入欧洲经济,这为它的经济趋同提供了机会。然而,转型期的持续时间超出了预期,原因是新技术的采用、资源的重新分配、新法规的推行需要时间,经济主体不得不进行调整。政府的政策错误导致情况更加严重,原因是为了短期经济增长而纵容宏观经济失衡的加重。事实使匈牙利政府认识到,没有健全的宏观财政平衡,就不可能实现长期的经济趋同。

最后一点,在最近的十年,匈牙利已经开始充分利用它的历史机遇。政府意识到,政策的目的是提高竞争力、巩固宏观财政稳定性,同时确保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事实证明政府的新观点是正确的,2013年后,经济开始快速趋同。目前,匈牙利的经济形势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好,即使是在全球危机期间,政府也仍然有充分的回旋余地来保持发展。

## 备注

<sup>1</sup> 指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其著《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匈牙利语版1959的出版。

<sup>2</sup> 分别指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美国经济学家、现任麻省理工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凯梅尔·达隆·阿齐默鲁(Kamer Daron Acemoglu, 1967-)和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詹姆斯·达隆·阿齐默鲁(Kamer Daron Acemoglu, 1967-)和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詹姆斯·达隆·阿齐默鲁(Kamer Daron Acemoglu, 1967-)

斯·艾伦·罗宾逊 (James Alan Robinson, 1961-), 他们二人在2012年出版《国家为什么失败: 权力, 繁荣与贫困的起源》一书。

- <sup>3</sup> 1920年一项制定匈牙利边界的条约, 又称《特里亚农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 奥匈帝国灭亡, 奥地利帝国的成员匈牙利王国宣布独立。由于奥匈帝国包含数个不同种族, 匈牙利的边界进行了重新划定, 在各继承国中占人口30%的匈牙利人成为少数民族。该条约于6月4日在法国凡尔赛大特里亚农宫签署, 分别是战胜国美国、英国、法国与意大利, 以及刚独立的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 及捷克斯洛伐克; 战败国就是代表奥匈帝国的匈牙利。《特里亚农条约》使匈牙利失去了大部分国土。
- <sup>4</sup> 克莱贝尔斯堡·库诺 (1875–1932), 1921–1922年任匈牙利内务部长, 1922–1931年任匈牙利宗教与公共教育事务部长。
- <sup>5</sup> 拉特科·安娜 (Ratkó Anna, 1903–1981) 1948年至1953年担任人民福利部及期间改名为卫生部的部长。从1950年起, 为增加全国人口, 她倡导实行禁止堕胎和征收无子女税的政策, 至该政策取消的1956年这一时候, 被称为“拉特科时代”。
- <sup>6</sup> 在1990年进行的政治转型后第一次大选中, 安道尔·约瑟夫 (1932–1993) 领导的民主论坛获胜, 并组成联合政府, 安道尔作为民主论坛主席出任总理, 不过他在任内因病去世。

##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 – Robinson, J. A.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Publishers. D·阿赛莫格卢、J·A·罗宾逊(2012年):《国家为什么失败: 权力, 繁荣与贫困的起源》, 美国王冠出版集团
- Baksay, G. – Nagy, Á. – Palotai, D. – Szalai, Á. (2020): *A reformok és a felzárkózás évtizede – 50 reformlépés az egyensúlyi felzárkózás megteremtéséhez*. Magyar Nemzeti Bank. 包克绍伊·G、瑙吉·Á、保洛陶伊·D、萨劳伊·Á(2020年):《改革与趋同的十年——创建平衡趋同的50个改革举措》, 匈牙利国家银行
- Berend, T. I. – Ránki, Gy. (1972): *A magyar gazdaság száz éve*.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Budapest. 拜兰德·T·I、兰基·Gy(1972年):《匈牙利经济一百年》, 匈牙利经济与法律出版社, 布达佩斯
- Bokor, B. (1955): Magyarország háborús károsodása a II. világháborúban. *Statistikai Szemle*, 33(2):183–189. 波科尔·B(195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遭受的创伤》, 匈牙利《统计评论》33(2):183-189
- Botos, J. (2016): *A pengő megsemmisülése, a forint születése, 1938–1946*. <https://epa.oszk.hu/00900/00995/00045/pdf/>. 波多什·J(2016年):《本戈的废除与福林的诞生, 1938–1946》
- Gunst, P. (1996): *Magyarország gazdaságtörténete (1914–1989)*. Nemzeti Tankönyvkiadó, Budapest. 昆什特·P(1996年):《匈牙利经济史(1914–1989)》, 匈牙利国家教科书出版社, 布达佩斯
- Hajnal, M. – Várhegyi, J. (2019): *Három a magyar igazság – fontos mérföldkőhöz ért a hazai infláció*. Magyar Nemzeti Bank. 豪伊瑙尔·M、瓦尔海吉·J(2019年):《三个匈牙利真相——国内通货膨胀达到重要里程碑》, 匈牙利国家银行
- HCSO (1989): *Népgazdasági mérlegek, 1949–1987*. Hungarian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Budapest.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1989年):《国家经济平衡, 1949–1987》,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布达佩斯
- HCSO (1996): *Magyarország népessége és gazdasága: múlt és jelen*. Hungarian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Budapest.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1996年):《匈牙利的人口与经济: 过去与现在》,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布达佩斯

- Honvári, J. (2013): XX. századi magyar gazdaságtörténet, Universitas-Győr Nonprofit Kft., Győr.  
洪瓦里·J(2013年):《20世纪匈牙利经济史》, 匈牙利久尔大学非盈利公司, 久尔
- Jakab, M. Z. – Szapáry, Gy. (1998): A csúszó leértékelés tapasztalatai Magyarországon. *Közgazdasági Szemle*, 45(10):877–905. 亚考伯·M·Z、萨帕里·Gy (1998年):《匈牙利下滑式贬值的经验》, 匈牙利《匈牙利经济评论》45(10):877-905
- Kaposi, Z. (2010): *Magyarország gazdaságtörténete, 1700–2000*. Dialog Campus Kiadó, Budapest–Pécs. 考波什·Z(2010年):《匈牙利经济史1700-2000》, 校园对话出版社, 匈牙利-佩奇
- Matolcsy, M. – Varga, I. (1938): *The National Income of Hungary*. P.S. King and Son Ltd., London.  
毛托尔齐·M、沃尔高·I(1938年):《匈牙利国民收入》, P.S. King and Son出版公司, 伦敦
- Matolcsy, Gy. (1996): Gazdasági és társadalmi sokterápiák 1990 és 1995 között Magyarországon. *Társadalmi Szemle*, 51(5):3–14. 毛托尔齐·Gy(1996年):《1990-1995年匈牙利经济和社会的休克疗法》, 匈牙利《匈牙利社会评论》51(5):3-14
- Matolcsy, Gy. (2015): *Egyensúly és növekedés. Konszolidáció és stabilizáció Magyarországon, 2010–2014*. Kairosz Kiadó, Budapest. 毛托尔奇·Gy(2015年):《平衡与增长。匈牙利的巩固与稳定, 2010–2014》, 凯罗斯出版社, 布达佩斯
- Matolcsy, Gy. – Palotai, D. (2016): A fiskális és a monetáris politika kölcsönhatása Magyarországon az elmúlt másfél évtizedben. *Hitelintézet Szemle*, 15(2):5–32. 毛托尔齐·Gy、保洛陶伊·D(2016年):《过去十五年匈牙利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 匈牙利《金融与经济评论》15(2):5-32
- Matolcsy, Gy. – Palotai, D. (2018): A magyar modell: A válságkezelés magyar receptje a mediterrán út tükrében. *Hitelintézet Szemle*, 17(2):5–42, [www.hitelintezetiszemle.hu/letoltes/hsz-17-2-t1-matolcsy-palotai.pdf](http://www hitelintezetiszemle.hu/letoltes/hsz-17-2-t1-matolcsy-palotai.pdf). 毛托尔齐·Gy、保洛陶伊·D(2018年):《匈牙利模式: 匈牙利与南欧国家危机管理措施比较》, 匈牙利《金融与经济评论》17(2):5-42
- MNB (2016): *A forint 70 éve. Út a hiperinflációtól az árak stabilitásáig*. Magyar Nemzeti Bank. 匈牙利国家银行(2016年):《福林七十年。从恶性通货膨胀到价格稳定》, 匈牙利国家银行
- MNB (2020): *Trianon 100. Tízszáz év számokban*. Magyar Nemzeti Bank. 匈牙利国家银行(2020年):《特里亚农一百年。10x10年的数据——过去一百年的匈牙利经济史》, 匈牙利国家银行
- P. Kiss, G. – Szapáry, Gy. (2000): Fiscal Adjustment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Hungary, 1990–1999. *Post-Soviet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1(4), <https://doi.org/10.1080/10889388.2000.10641140>. P·基什·G、萨帕里·Gy(2000年):《转型过程中的财政调整: 匈牙利1990-1999》, 英国《后苏联时代地理学与经济学》杂志41(4)
- Romsics, I. (2017): *A Horthy-korszak*. Helikon Könyvkiadó, Budapest. 罗姆西奇·I(2017年):《霍尔蒂时代》, 匈牙利赫利孔出版社, 布达佩斯
- Smith, A. (1959): *A nemzetek gazdagsága*.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Budapest. 史密斯·A(1959年):《国富论》, 匈牙利经济与法律出版社, 布达佩斯
- Szakács, S. (2000): *Gazdaságtörténet II. Számalk* Kiadó, Budapest. 萨卡齐·S(2000年):《经济史II》, 匈牙利萨马尔克出版社, 布达佩斯